



姜智芹 / 著

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

——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中华书局

姜智芹 / 著

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

——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姜智芹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8.4
ISBN 978 - 7 - 101 - 06007 - 2

I. 镜… II. 姜… III. ①民族性 - 中国 - 文学研究 - 英国②民族性 - 中国 - 文学研究 - 美国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7498 号

-
- 书 名 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
——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 著 者 姜智芹
- 责任编辑 张彩梅
-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版 次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3}{8}$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 印 数 1 - 3000 册
-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007 - 2
- 定 价 28.00 元
-

导 言

异国形象是一国文学中对他国的塑造和描述，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法国当代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D. H. Pageaux）将之定义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①。形象学研究一国形象在异国的文学流变，即它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被流传的，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找出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以便更好地认识别人，反省自己，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互惠交流。

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巴柔在对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进行定义时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这个‘我’想说他者（最常见到的是出于诸多迫切、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异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它一方面照出了异国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照见了形象塑造者一方的形象，显现了其自身的欲望、恐惧与梦想。

^①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157页。

异国形象与文化认同密不可分，异国形象创造是一个借助他者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是对自我文化身份加以确认的过程。所谓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通常指某一特定文化所具有的特征，是“一个个体或族群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确定自身身份的尺度。换言之，认同问题解决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的问题。有了这个自我确认的标准，人在与世界相处时就有了确定的方位定向；与此相反，认同危机的表征则是失去了方位定向，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① 随着当代形象学从对他者文化的阐释转向对自我文化的确认，借助他者形象这面镜子认识自我是形象塑造者的一个重要动机，无论形象创造者对他者文化持肯定还是批判的态度，无论是从他者文化中去寻求差异性还是同一性，其结果都可能对形象创造者自我文化认同的强化和补充。这种以描写他者形象为自己定位的方式在殖民主义文学创作中成了普遍的书写策略，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R. 吉卜林出于自我认同的焦虑，不断地借助对东方形象的塑造来寻找心理平衡。他的长篇小说《吉姆》中那个“完全印度化了但又不失其英国人本性的白人孩子”吉姆的探索之旅，其本身隐喻着作者的精神探索，“那个男孩追寻自己的身份正好映射了吉卜林本身对自我界定的探索”^②。

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之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以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丰富，既有分国别、分时

① 陶东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与文化认同》，收入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03—204 页。

② Robin W. Winks and James R. Rush eds., *Asia in Western Fic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0.

段的论述,也有西方之中国形象这一大语境中或宏观或微观的探讨。就国外研究来说,比较重要的论著包括1938年美国学者M. G. 马森的《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①,此书重点探讨了西方人士如何从17、18世纪对中国的钦慕转变成19世纪的鄙视。1946年,路易斯·玛弗里克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欧洲的典范》^②,里面收录了法国重农学派领袖奎奈的《中国专制政治》(*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 1767*),倡导当时的法国进行改革,向法国人推荐中国“哲人王”式的君主专制模式。1958年,哈罗德·伊萨克斯出版了《心影录:美国的中国与印度形象》^③,该书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了美国人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转变及成因,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由于殿利、陆日字译成中文,名为《美国的中国形象》,1999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1961年,休·奥诺出版了《中国热:契丹形象》,描述了西方从远古时代到19世纪对中国文化、艺术、器物等的仰慕,以及中国文明形象对欧洲的影响。1965年,唐纳德·拉奇出版了他的堪称鸿篇巨制的丛书《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用》^④,让西方读者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风采。1967年,英国学者雷蒙德·道森的《中国变色龙》^⑤面世,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

① Mary G. Mason, *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0—1876*.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39.

②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Texas: Paul Anderson, 1946.

③ Harold R.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8.

④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⑤ Raymond Dawson,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① 1971年，罗伯特·麦克莱伦的《异教徒中国佬：美国的中国态度研究》^②一书问世，这本专著探索了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人在和华工的交往接触中发生的一连串不愉快的事情，由于华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会讲英语，又被认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因而在美国人脑海中形成一种较为负面的中国形象，并对以后美国的中国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年与1984年，亨利·A. 迈耶主编的《西方眼中的中国与远东》^③上下两册先后在香港出版，书中收集了10篇由不同学者撰写的论文，介绍了从古代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中国及东亚的观感。1989年，科林·麦克拉斯出版了他的《西方的中国形象》^④一书，对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形象分阶段进行了探讨。199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授学者牵头撰写的论文集《西方小说中的亚洲形象》^⑤出版。该论文集是“帝国主义研究丛书”中的一本，主要探讨和研究了英、美、法、荷兰等国文学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亚太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虚构再现”。丛书主编迈肯泽（John M. McKenzie）在“总序”的开篇就指出了这套丛书的用意所在：“帝国主

① 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常绍民、明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页。

② Robert McClellan, *The Heathen Chinese, A Study of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hina, 1890—1905*.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③ Henry Myers, *Western Views of China and the Far East*. Hong Kong: Asian Research Service, 1982.

④ 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⑤ Robin W. Winks and James R. Rush eds., *Asia in Western Fic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义远非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现象，它是欧洲世界处于优越时期的一种思维习惯、一种占统治性的观念。这种欧洲优越性普遍存在于精神、文化和技术的各种表述里面。”^①因而，探索这些过去少有人涉足的各种表述里的帝国主义形象，便是该丛书的目的。由于亚洲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能给欧美人以想象的空间，所以，欧美人“将他们的恐惧和抱负、梦想和欲望投射到亚洲国家”^②。该论文集的价值在于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学作品中的国家形象，集中展示了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90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批判，分析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强势文化。1998年，耶鲁大学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出版了他的《大汗之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③，分十二个专题论述了从马可·波罗到20世纪西方作家笔下新奇多样的中国形象，描述了七百多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洞察与偏见。

此外，国外尤其是美国也出现了一批有关中国形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就近五十年的情况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约翰·福斯特的《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和中国人：1850—1950》^④，这篇论文写于1952年，通过对美国人一百年里撰写的有关中国形象的诗歌、戏剧、小说的筛选，研究美国作者所展示和描述的中国。福斯特将这一百年里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置于美中关系这一大背景下加以探讨，把两国百年间的关系看做是在帝国主义总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并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得出美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对中国的

① Robin W. Winks and James R. Rush eds., *Asia in Western Fiction*, p. viii.

② Ibid.

③ 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④ John Burt Fos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850—1950*.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52.

态度是爱憎分明的看法，这种两极摇摆的观点其后在伊萨克斯的《心影录：美国的中国与印度形象》中得到了印证，伊萨克斯这样概述：“中国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以相互对立的两方面出现。中国人被看做是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异常恼人的野蛮人和极具吸引力的人道主义者；贤明的哲人和虐待狂般的刽子手；勤俭而令人尊敬的人和狡猾而阴险的无赖；喜剧的战士和危险的斗士。”^①

1966年，斯图尔特·米勒完成了博士论文《不受欢迎的移民：1785—1882年间美国人的中国观》，1969年在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将该论文出版^②。该论著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出发，深入研究了美国建国一百多年里，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过程，认为19世纪美国正热衷于现代化进程，整个社会把中国视为与其时美国的进步、自由、文明等理想背道而驰，是一个停滞、专制、堕落的国家。

1979年，伍家球（William Wu）在密执安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黄祸：1850—1940年美国小说中的华人》^③。论文首先介绍、分析了早期美国边疆故事中，以及这一时期两家美国杂志——《陆路月刊》（*Overland Monthly*）和《加州人》（*Californian*）对中国人的描述，然后分两个阶段重点分析了美国小说中对“中国城”的审视与刻画，进而以傅满洲（Fu Manchu）和陈查理（Charlie Chan）这两个华人形象为个案，探求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形象的概括。在结论中作者认为，1850至1940年间；美国小说中的华人形象始终

① 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② Stuart Creighton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③ William Wu, *The Yellow Peril: 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9.

贯穿着“黄祸”主题。

1985年，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布莱恩·布朗完成了博士论文《同一条丝线：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与日本人》^①，该论文运用后殖民理论，将美国人头脑中形成的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想象与定型化归结为他们对东方人的整体观念。论文作者强调，这种建立在19世纪文化帝国主义之上的观念，恰恰是基于美国人对自己国家自我形象的塑造。因为“从杰斐逊到杰克逊的整个过程，正在成型的美国自我形象，几乎完全是以最优美的术语定义的”^②。在如此自视优越的自我形象背景下，美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东方国家的观察与评价，就必然会带有西上东下的比较。结果，亚洲国家的政府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不外是仁慈的独断专行者，最糟则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独裁统治者；亚洲经济也只能是以物易物、勉强维持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亚洲人在文化上落后、智力上贫乏^③。“贯穿中国与日本定型化形象背后的是交织在东方形象中的同一条丝线。从一开始，这个基本形象就是建立在由无知、恐惧、种族反感等所带来的扭曲的事实和夸张的介绍之上的。”^④

1987年，伊利诺依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加里·托德（Gary Todd）完成了其博士论文《美国人所看到的中国：1840—1860》，该论文通过考察19世纪中期公开发表的大量文献，比如报刊文章、书信日记、诗歌作品、教材、游记等，来梳理该时期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论文作者认为美国在19世纪上半期仍然处

① Blaine T. Browne, *A Common Thread: American Images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1930—1960*.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85.

② Ibid., p. 6.

③ Ibid., p. 7.

④ Ibid., p. 424.

于自我定位时期，在对待不同文化时，通常以展示自己不同于“他们”而更明确地给自己定位。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归纳分析，作者发现这一时期美国主要把中国看做一个商贸地区、一处基督教传教场所、一个令人偶感好奇的源泉、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国。作者注意到，这些公开发表的观察中国的文章，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带有偏激的特点，其结果是造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常常充满矛盾，似乎在东方的土地上同时存在着浪漫优美和道德沦丧这样两个极端的中国。

1990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完成了博士论文《美国的中国形象：1927年至1950年传教士的两难处境》^①，该论文关注的是新教传教士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的记录，论文涉猎了大约七十位传教士自1927年至1950年在华生活期间所记述、撰写的九十部著作。在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随着众多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和其他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到美国，美国人对中国的注视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论文作者认为，与欧洲传教士提供给人们的一个模糊不清的图像不同，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为美国人展示了一个基督教视野下清晰明白的中国形象。

1995年，芝加哥大学西比尔·弗里茨（Sybille Fritzsche）的论文《叙述中国：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旅行者在中国》^②分析了19世纪后半期西方游记作者笔下的中国形象，集中揭示了西方作者对中

^① Elizabeth Vanderzell Anderson, *Images of China for Americans, 1927—1950: The Missionaries' Dilemma*. Ph. D. dis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1990.

^② Sybille Charlotte Fritzsche, *Narrating China: Western Travelers in the Middle Kingdom after the Opium War*.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国这一“他者”的建构。论文重点梳理了西方游记作者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而不是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学、道德或哲学书籍的分析和理解。作者的分析认为，19世纪后半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呈现出两种形象：一是多数人的看法，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本质特征的东方国家，另一些人则把中国视为一种“欧洲的落后形式”，认为中国因缺乏科学技术而偏离了普遍的历史进程。这两种形象都足以西方干涉和侵略中国找到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这是世界历史进程所赋予他们的“文明使命”，掩盖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寻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这一真实的目的。

1999年，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孙荣光完成了博士论文《亚裔美国人“模范少数族裔”和“黄祸”形象之评估》。作者的动机是要研究亚裔美国人何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视为“黄祸”，而在1960年以后又常常被看做“模范少数族裔”。新闻媒体所塑造的这种分裂形象正是论文分析的对象，论文主要对《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时报》所刊载的有关亚裔美国人的文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虽然这些代表性报纸上所呈现出的亚裔美国人形象具有更多的正面特点，但是，在政治范围内，一种负面的高级潜在犯罪者形象也被建构起来。作者的结论认为，“模范少数族裔”和“黄祸”形象的交叉，成为美国媒体长期展示的亚裔美国人的定型化形象，这两种形象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因素的变化，会在一个时期里偏重于“模范”形象，而在另一个时期里主要以“黄祸”形象出现。这两种形象的背后折射出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美国人的无知和缺乏应有的理解。

在国内学术界，对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早在20世纪

初期就有涉及，目前更是方兴未艾。就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来说，1929年陈受颐先生在《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1930年和1931年又连续在《岭南学报》上发表了《鲁滨孙的中国观》（第一卷第三期）、《好速传之最早的欧译》（第一卷第四期）和《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第二卷第一期）。1931年，方重先生在《文哲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的长文，对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梳理。1935年，《南开社会经济季刊》（*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发表了陈受颐先生的《丹尼尔·笛福：中国的严厉批评者》（*Daniel Defoe, China's Severe Critic*），1939年，他的《奥利弗·哥尔斯密和他的中国人信札》（*Oliver Goldsmith and His Chinese Letters*）在《天下月刊》（*T' ien Hsia Monthly*）上发表，两篇文章分别就笛福、哥尔斯密对中国人的描写做了细致的分析。此外，1940年，钱钟书先生于1935—37年撰写的学位论文《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在《中国书目季度报告》第一卷（*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I*）上刊出；1941年，他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在《中国书目季度报告》第二卷上与读者见面。钱钟书先生结合时代背景，对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是研究英国文学中对中国形象塑造的极为难得的资料。范存忠先生也对研究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作出了贡献，他早在1931年就在《金陵学报》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约翰生、高尔斯密与中国文化》，20世纪40—50年代又写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文章，如1940年《青年中国季刊》第

二卷第三期上的《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1942年《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1947年《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四十六期上的《琼斯爵士与中国》；1957年《文学研究》第三期上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等。1991年，在范先生去世四周年之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作《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此书对18世纪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做了全面的梳理，是研究英国文学中对中国形象塑造的珍贵资料。以上几位先生大都在欧美国家留过学，以中国文化在英国的影响或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为题目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写作时参考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梳理、分析、论证翔实、可信，但偏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尚有待于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开掘。

新时期以来，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形象学研究在中国开始受到重视，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引起了一些学者探索的热情。1981年，杨周翰在《国外文学》上发表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17世纪英国作家与知识的涉猎》，1989年5月，李爽学在《中外文学》第十七卷第十二期上发表了《傲慢与偏见——毛姆中国印象记》。青年学者葛桂录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论文：《欧洲中世纪一部最流行的非宗教类作品——〈曼德维尔游记〉的文本生成、版本流传及中国形象综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托马斯·柏克小说里的华人移民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论哈罗德·阿克顿小说里的中国题材》（《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德·昆西眼里的中国形象》（《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5期)、《“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黄祸”恐惧与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洲形象》(《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等论文,并于2002年出版了《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论稿》(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葛桂录的论文及专著对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与分析,提供了较为珍贵的资料和文献。

笔者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出版了专著《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发表了论文《英国历史“中国风”》(《中外文化交流》,2006年第4期)、《非我与他者:英国文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东岳论丛》,2005年第5期)、《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忽必烈汗〉残篇里的奇幻中国》(《名作欣赏》,2006年第12期)、《颠覆与维护——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透视》(《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国外文学》,2004年第1期)等。

国内对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实绩,比如胡永洪的论文《布勒特·哈特的华人叙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该文重点分析了哈特的两篇以华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异教徒中国佬》和《异教徒李顽》,认为哈特对待华人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谴责针对华人的暴行,同情华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面又塑造了歪曲、片面、刻板的华人形象,反映了作者和美国大众的东方主义思想。

崔丽芳的论文《马克·吐温的中国观》(《外国文学评论》,

2003年第4期)旨在对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华人形象和中国题材进行重新梳理,进一步探究作家的中国观及其形成的背景因素,认为吐温的人道主义立场和社会责任感使他的中国观较之前人甚至同时代人有了较大的进步,具体表现在他早期作品中对旅美华工的同情和后期作品中对饱受列强凌辱的中华民族的关注。但是囿于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心理的需求,吐温笔下的中国形象仍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作家的好奇、偏见、轻视、排斥等心理色彩。

潘志高的《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变与不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中认为中国在美国人眼中的形象有其多变的一面,也有其不变的一面,在多变的形象中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中国一直被美国当做低一等的、需要帮助和拯救的国家来看待。

就单个作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来说,中国学者关注得比较多的是赛珍珠。中西双重文化背景和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使她成为美国文学中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作家,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因而引起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热情。比如徐清的《幻象与真相——论赛珍珠小说〈同胞〉中的中国形象》(《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该文认为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既不重复那些歪曲中国本来面目的套话,也不刻意制造美化中国的神话,而是进行了较为真实、客观的描述。再比如顾钧的《论赛珍珠建构中国形象的写作策略》(《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指出在赛珍珠之前,许多西方作家都曾在作品中描写过中国,但是他们笔下的中国不管是作为被丑化的对象还是被赞美的对象,总是根据西方人自身的需要而并非中国的实际来描写的。赛珍珠的写作则与此相反,她代表了一种真正

去了解异国并诉诸笔端的新的写作姿态。为了建构新的中国形象，赛珍珠在叙事模式、民俗描写、人物选择、语言风格、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模仿等五个方面采取了与以往作家完全不同的写作策略。

研究美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专著在国内也有出版，比如200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弘等著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该书分专题论述了布勒特·哈特、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斯诺、赛珍珠、赫西等人创作中的中国形象，探讨了爱默生、梭罗、庞德、奥尼尔等人对中国儒、道文化的钟情与理解，比较了福克纳与中国新时期小说、垮掉的一代与新新人类之间的影响与变异、相似与差异，分析了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创作中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反思。

宋伟杰的《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分三大章——“美国白人小说家与中国”、“美国华人和华裔小说家”、“美国白人及华人戏剧家与中国”，对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特别是第一章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一部分与我们前面提到的伍家球的博士论文《黄祸：1850—1940年美国小说中的华人》相映照，论及许多我们在中文文献资料中难以找到的、描述中国和中国人的美国作家作品。遗憾的是作者对很多原典资料的引用未加注释，缺乏学术规范性和严谨性。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视野更开阔、成果更丰硕的是厦门大学的周宁教授，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宁有关这一方面的重要论文有：《西方现代性源起的中国灵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人文杂志》，2005年第6